

南宋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交流

朱德明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杭州 310053)

【摘要】南宋时期,浙江一举成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重地。临安(今杭州)、明州(今宁波)、台州、温州等与东南亚诸国、阿拉伯国家乃至东北非洲,都有广泛的医药交流,在中外医药交流史、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南宋;浙江;医药;交流

【中图分类号】R-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0772(2005)11- 0040- 04

南宋时期,浙江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海外贸易的扩大,临安成了全国的商业中心,城外郊区出现了 15 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明州、越州和温州等地的商品经济,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浙江各港口北达高丽,东抵日本,南到南洋,西到西洋各国和非洲地区。南宋时期浙江海外贸易的方式大体分为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大类。官府经营的方式一种是“朝贡”或“交聘”贸易,南宋建都临安,它是“朝贡”、“交聘”贸易的中心;另一种是官府直接派人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私商经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具有政治身份的豪门、权贵,一种是民间私商,两种人员在浙江大有人在。

1 人员的往来

南宋时期,浙江与国外的使节往来较多,亚洲、西欧、北非等地都有使节来临安等地访问交流。邻国的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学习中医药学,然后携宝回国推广的大有人在,日本尤为彰显。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从明州港出发赴日的浙江商船很多。浙江商人结伙成帮,赴日贸易,不少浙江商人还与日本朝臣或九州地区王公贵族之家结成了“寄人”关系,他们利用其家族声威,取得对日贸易的立足之地。故在日本沿海,多有浙江商人居留,在其重要港口如敦贺、博多地区,浙江商人留居者尤多。据记载,仅 1151 年,浙江等地商人居住日本博多地区者,多达 1600 多家,可见中日两国民间经济文化交流趋上升势头。此外,与民间交流相辅相成的是日僧相继来浙江巡礼佛迹、增强个人佛法修养和功夫。日僧来浙江者虽不如唐代多,但他们在日本政府禁止遣宋的情况下,为繁荣中日文化交流赴汤蹈火,精神可贵。

南宋时期来浙江从事文化(含医药)交流的有三位日僧木下道正、圆尔辨圆、荣西。日僧木下道正在 1223 年随同道元来明州,向明州名医学习中医药学,精通解毒丸制配法,并把该项技术传入日本。

圆尔辨圆,即圣一国师,本是东福寺开山,1235 年来浙江,历访浙江天童、净慈、灵隐等名寺,在杭州等地学习 6 年之久,于 1241 年回日本,携带中国典籍数千卷,入藏京都普门院书库。圆氏撰有《三教典籍目录》,该目录虽已不存于世,但尚有其 28 世孙大道一另著普查目录。其中有经纶章疏 170 多部,370 多卷;又有僧传、僧集、儒家著作、诗文集、医书、字帖等 230 多部,共 960 多卷。在医书中,包括南宋宝庆 3 年(1227 年)刊刻《魏氏家藏方》11 卷等,计有 30 多部。特别是《魏氏家藏方》,刊刻仅 14 年,即

*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No. 2003R004)成果一。

作者简介:朱德明(1957-),男,浙江人,副教授,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医史分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医史文献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5- 06- 30

由圆氏带回日本,可见中日医药交流神速。

日本饮茶至迟从 729 年开始。是年(日圣武天皇天平元年)4 月 8 日,日本圣武天皇召集僧侣百名在宫廷讲经,次日,又召见赐茶(又称行茶)。日本种植茶树则始于唐永贞元年(805 年)。是年,日僧最澄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成归国,带去茶种,种植于日本近江(今贺滋县)。这是中国茶种向外传播的最早记录。

南宋时期,饮茶作为医药卫生保健养生之法在日本再掀高潮,来浙江的僧人荣西功不可没。荣西(1141 年~ 1215 年),日本备中(今风山县)吉备郡人,号明庵,南宋乾道 4 年(1168 年)4 月,渡海入明州,先访广惠禅寺,不久到天台山,登万年寺,从禅宗大师虚庵怀敞受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淳熙 14 年(1187 年)4 月,再度入南宋浙江明州,本拟去天竺(印度)巡礼佛迹,因当地知府以“关塞不通”劝阻,遂先至临安,后登天台山,谒虚庵怀敞,学习禅法,重修万年寺山门、两庑,修缮智者塔院。淳熙 16 年(1189 年)虚庵移住明州天童寺,荣西随侍,协助营建千佛阁,孝宗因赐千光法师称号。绍熙 2 年(1191 年)7 月,荣西受大戒和伽裟回国。可以相信荣西两次来南宋浙江留学,在 5~ 6 年之际,即学禅,又学医。他不但学习了佛经的医方明,而且对中国养生与疾病防治进行过研究考察,并向南宋浙江医学家请教。

荣西住天台山时,每逢春夏,考察采茶和种茶技艺,调查饮茶习俗,回国时携带了天台云雾茶籽,播种于筑前(今福冈县)的脊振山和博多的福寿山,还播种于尾山(今宇治)后成为日本产茶区。1211 年所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茶道先声,被尊为“日本的陆羽”。荣西撰《吃茶养生记》宣传推广饮茶,其目的正是为了给日本人提供防治疾病、养生延年的知识。该书分上下两卷,开首便明确强调:“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又如该书强调:“今得唐医口传,治诸病,无不得效验矣。”在书末又称:“此等记录,皆有禀承于大国乎,若不审之,到到,询问无隐。”荣西对中国茶的养生延年与防治疾病深信不疑。他个人的实践和他为人防治疾病的效验,更对他推广种植茶和提倡饮茶十分有利。荣西提倡种茶,推广中国茶文化,更有其自己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医学理论有五味入五脏之说,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只酸、甘、辛、咸四味,而缺少苦味,苦入心,心为五脏之主,缺苦味则心有所伤。茶味苦,饮茶则入心强心,故为养生仙药,延年妙药。他引用中国唐宋文献中有关采摘、制法等,一一予以说明。此外,《吃茶养生记》的下卷,还较系统地记叙了桑的功能与用途,介绍了桑粥、桑汤可治疗饮水病、中风、不食证、瘰病、脚气病等。荣西推崇桑为治疗多种疾病的灵药,其桑粥可能是日本较为有效的食疗。该书参考宋朝《大观本草》,提出喝茶有益于养生、香药末可煮成鲜暑饮料,实是一部医书。

1214 年,幕府将军源实朝患病,荣西察其为宿酒过度余醺所致,便以清茶进献,病愈,并以所著《吃茶养生记》2 卷赠之。自此,尾山之茶种传播全日本,日本多以此地为名茶产地,日本饮茶风气再度盛行。饮茶在日本作为卫生保健的一种手段,则日益为朝野民众所接受。日本在我国南宋金元时期兴起“茶道”,一时风行各地,饮茶习俗已逐渐日本化。

2 香药的进口

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大食、古逻、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珀、珠、银铁、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苏木等物”(《二十五史·宋史(上)》册 7.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 760.)。

在这些众多的海外进出口货物中,以药材为主,尤以香药独占鳌头。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晚期宋徽宗一代,从宫廷到贵戚,从官僚士大夫到权宦,对香料的靡费更达到惊人的地步。陆游在他的《避暑漫抄》中写到:“宣政宫中,用龙涎沉脑屑和蜡为烛,两行列数百枝,艳明而香溢”,连宋高宗赵构也自愧不如他的“爹爹”富贵。到南宋,随着市舶贸易进一步地发展,香料进口增加,香料也随即增长。李心传曾指出绍兴 6 年(1136 年)榷货务的 1300 万缗总收入中,“大率盐钱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 6 年 8 月条. 卷 104.)。绍兴 11 年(1141 年)11 月,户部“重行裁定市舶香药名色”,共有 330 余种(宋会要辑稿·职官. 44. 21- 23.),其中绝大部分是香药和药材,主要从大食诸国、真腊、占城、婆等国输入。1144 年和 1147 年南宋朝廷两次下诏从国外大量进口香药。其数量亦大得惊人,有时一次就达成千上万斤。这些药物的输入对中医药的发展有利。

这些香药确有理气和胃、健脾燥湿、芳香开窍、活血化瘀等功能,用以治疗脾胃虚寒、脾胃不和、湿因中焦、气滞血瘀、经络痹阻、中风阴闭等症卓有疗效。香药输入的增多,临床应用亦随之增加、普及。在宋代的许多方书、本草书中记载着大量的有关资料,在众多的方剂中也配上这类香料药,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丁香丸,由丁香、沉香、木香、丁香皮、白豆蔻组成;生气汤是丁香皮、胡椒、丁香、檀香、干姜、甘草相伍;苏合香丸、安息香丸等亦是如此。又如《圣济总录》中的五香汤方,五味全是香药组方,即熏陆香、麝香、木香、鸡舌香和沉香。《全生指迷方》中也有五香散方,其主要药物是木香、丁香、沉香、乳香和麝香。香料药在方剂中的普遍出现,是南宋浙江医方的一种特色,相继产生了滥用的流弊。南宋一些医家看到这一问题,如张锐在《鸡峰普济方》中指出,临床所见五脏焦枯,血气于涸之病证,常为燥热药用之不当所致。南宋杨士瀛对滥用麝香、龙脑等香药亦有微词异议:“每见发热发搐,辄用脑、麝,……视之为常,惟其不当用而轻用,或当用而过用之”,“或当用而不可无之,亦须酌量勿过剂。”说明在当时医家对辛香药物的使用已有了新的认识^[1]。元代医家朱丹溪针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方剂中含有许多香燥药,在其《局方发挥》中便大加抨击,尤其告诫人们,对香燥药不能“多服、常服、久服”,因这些辛香刚燥药剂,有耗津、却液、伤阴、助火弊病,过用则极易造成人体阴液匮乏。

在讨论香药的利弊之余,再来稽探一番南宋时期浙江从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进口香药等药材的盛况。

3 与周边国家的药材贸易

3.1 东北亚各国

3.1.1 日本

南宋时,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乾道3年(1167年),代表武士利益的平清盛(1118年~1181年)战胜旧贵族,取得了日本政权,为了发展日本经济,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进取政策,大力提倡宋日贸易。平清盛曾策划开辟音户的濑户(今日本广岛县吴岛与仓桥岛之间的海峡)和修建摄津福原的轮田泊(在神户港附近),以便停泊南宋的船只;并对赴日的宋船又给予优厚的待遇,使宋日贸易日趋频繁。浙江与日本之间的航路都由明州出海,向东横渡东海,到日本九州西北的直岛(今平户岛和五岛列岛)。当时南宋政府亦继续积极招徕日本商船,特别是南宋明州市舶司,不时给日本送牒书赠方物,以促进两国贸易。日本政府亦“托明州纲首”向宋赠“方物”,(二十五史·宋史(下).册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 772-6 773.)逐渐加强了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日宋商船来往频繁,临安、温州等亦对日开放,日船入港时,该地方市舶司对日人款待极厚。日船若遇暴风漂至南宋海岸者,宋廷照例下诏赈济钱米送回国。因此,自南宋中期以来,“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四明续志·蠲免抽博倭金.卷8.)13世纪时,日本每年有40~50只商船开往明州等地。这时日本输入南宋浙江的药物基本与北宋时期相同,主要有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硫黄、麝香、笏香、沉香、丁香、檀香、山香、龙涎香、降真香、茴香、没药、胡椒、槟榔、暂香、速香、香脂、生香、鹿香、黄熟香、鸡骨香、藿香、鞋面香、乌里香、断白香、包袋香、水盘香、红豆、荜拔、荜澄茄、良姜、益智子、蓬莪术、缩砂、三赖子、海阔皮、桂皮、大腹皮、丁香皮、桂花、姜黄、黄芦、木鳖子、茺蔚、香柿、磁藤子。其中硫黄是从日本进口的重要商品。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载,明州海商陈泳和广州海商曾聚等人,都从日本贩运硫黄到临安“抽解货卖”。南宋绍兴15年(1145年)11月,一艘日本商船漂泊到平阳仙口港,贩运的也是硫黄、布匹等货物(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15年11月丁巳条.卷154.)。这时从明州赴日的商船亦更加频繁,不仅驶到博多,还驶入越前(今福井县)的敦贺港。浙江输入日本的香药和药材颇多,中草药和中成药,如麝香、金益草、银益草、紫金膏、巴豆、雄黄、朱砂等,也随着医药交流大量输入日本。

因此,南宋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关系处于低潮,而浙江民间商人僧侣往来较为频繁。据日人腾原明衡《新猿乐记》载,日本进口定都临安的南宋货物达40多种,其中药材占一半以上。

3.1.2 朝鲜

高丽,即今朝鲜,与浙江历来有密切的药物交易。南宋时期,高丽有大量的药材从海上输入浙江,反之亦然。

浙江与朝鲜的航道根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亦由明州出海,经舟山洋面北上傍海而行,经黄水洋(长江入海口处),向东横渡黑水洋(北纬 32° ~ 36° 及东经 123° 以东海域),再折北经黑山岛、群山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至临津江、礼成江之间的贞州或礼成江口的碧澜渡登陆,全程需 20 天左右。据《高丽史》统计,自 1012 年至 1192 年的 181 年期间,宋商人到高丽活动的共有 117 次,其中能知道具体人数的有 77 次,每次由数名、数 10 名、300 多名不等,共计 4548 名。如绍兴 2 年(1132 年)4 月,高丽国王王楷遣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祇候沈起来定都临安的南宋朝廷朝贡,献人参 500 斤等,受到南宋高宗的接见。高丽发明了一种用药炮制的“脑原荣”,也深得浙江人民的喜用。高丽向浙江输出的药材还有银子、人参、麝香、红花、茯苓、蜡、枣肉、榛子、杏仁、椎子、细辛、山茱萸、白附子、茺藹、甘草、防风、牛膝、白术、远志、姜黄、香油等,其中野生药物占多数(四明志·叙赋(下)·市舶.卷 6.甬上烟屿楼徐时栋开刻本,咸丰甲寅版:5-7.)。

浙江人民对于从高丽输入货物的产地、性能、用途等情况相当了解。如《宝庆四明志》在高丽物货的“人参”条下云:“其干特立,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虚,入药则味全,然涉夏损蠹,不若经汤鉴而熟者可久留。旧传形扁者谓丽人以石压去汁作煎。今询之,非也。乃参之熟者积燥而致,尔其作煎,当自有法也。昔中国使至丽,馆中日供食菜谓之沙参,形大而肥美,非药中所宜用。”同时,南宋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2]。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 年),徐德荣奉孝宗旨意,从浙江临安朝廷出发将盛满沉香的金银器各二副赠给高丽毅宗帝。

3.2 东南亚各国

南宋时期浙江与“南海诸国”也有贸易往来。浙江前往“南海诸国”一般从福建泉州启航。由于中越两国地区毗连,使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更为方便,所以自南宋以来中越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当时定都临安的南宋与交趾、占城、安南三国的经济贸易交往,主要是通过两种贸易形式:一是政府间的交换贸易,即所谓的“贡”、“赐”贸易,一是私商经营的一般贸易。

交趾,在今越南北部,历来有输入中药的传统。南宋,中药是对交趾进行海陆贸易的重要商货,“宋以缎子、药物等物,置卖为市”^[3]。南宋时,交趾人来临安大量购买土茯苓,以致价格涨了数倍。交趾向定都临安的南宋输出的“贡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象、象牙、犀角、玳瑁、绢、绸、布、金银器以及其它高级工艺品等,其中以香药为大宗。因香药用途广泛,既是南宋统治者奢侈生活所必须,又是重要的药用原料,所以进口的数量很大。占城,在今越南中部,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药物交流中心。尤其南宋,从福建泉州港发船前往占城的浙江商人较多,经常成群结对,并以巨商为纲首。“纲首”陈应、吴兵等拥有较多的船只,除自贩货物外,还为占城“蕃首”运载乳香、象牙等“进奉物”来临安南宋朝廷。浙江巨商从浙江一些港口辗转泉州输往占城的货品有纸、笔、草席、凉伞、绢扇、漆器、铅、锡、脑麝、檀香、酒、糖及书籍等。

占城国在 1129 年、1155 年、1274 年、1280 年、1281 年、1285 年,陆续不断向临安南宋朝廷输入药材。据《四明志·市舶》记载,南宋宝庆年间(1225 年~ 1227 年)输入的药物除麝香、沉香、龙涎香、笏香、丁香、檀香、山西香、降真香、茴香、没药、暂香、速香、香脂、生香、粗香、黄熟香、鸡骨香、斩香、青桂头香、藿香、乌里香、断白香、包袋香、水盘香。从上可以看出,占城向宋输出的“贡品”基本和交趾相似,也以香药为大宗,但数字比交趾要大,如乌里香一次就达 55 000 多斤。

由于是“贡品”,既可以免税,又可获得更为丰富的“回赐”,所以有些越南“蕃首”一巨商首领,也常以“朝贡”的名义遣使入贡。乾道 2 年(1167 年),占城的“蕃首”邹亚娜遣使来临安向南宋“进贡”了大量的货品,计有白乳香 20 435 斤,混杂乳香 80 290 斤,象牙 7 795 斤等。南宋朝廷“许进奉十分之一,余依条例抽买”,“进奉物”待估价后,“听旨回赐”。

安南,在今越南南部。据《宋史·外国四》记载,1130 年安南国就曾进献方物。绍兴 26 年(1156 年),安南国使者入南宋,到临安后安排在怀远驿,南宋授其国王天祚为南平王,赐袭衣、金带、鞍鞞等物品。次年,安南国王天祚遣使李国等来临安向南宋进献黄金 1 136 两、明珠 100 颗、沉香 1 000 斤、翠羽 500 只、杂色绫 5 000 匹、马 10 匹、象 9 头。孝宗隆兴 2 年(1164 年),天

祚派遣尹子思、邓硕严等使者来临安,进献金、银、象(牙)、香物(料)等。乾道 9 年(1173 年),天祚又派尹子思、李邦正为使来临安,进献沉香 2 000 斤、驯象 18 头,住在怀远驿。

自 1263 年起,安南国每 3 年进献 1 次,并有医生同来。所赠药材有苏合香、光香、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等。上述药材已为《开宝本草》所记载,同时传入的还有治病药方。另一方面,安南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姚文东《安南小史》说:“(安南)国多产药草,但国人不知制之,皆一致于中国,中国制而复送于安南,土人谓之北药。”

真腊,今柬埔寨。1200 年,真腊国向临安南宋朝廷进贡药物等。

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海上贸易最大的转运站。因此,中国、印度、东南亚、阿拉伯、非洲的各种商品皆来这里集散。《诸蕃志》记载:“其国在海中,扼诸蕃舟车往来之咽喉。”“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外有珍珠、乳香、蔷薇水、梔子花、腊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皆大食(阿拉伯)诸蕃所产,萃于本国。”当时南宋与三佛齐政府都十分重视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友好交往,据《宋史》、《宋会要》等不完全统计,三佛齐向宋朝派出了外交使节 30 多次。三佛齐向南宋输出的物品很多,主要有象牙、珊瑚、珍珠、香料和药材等。绍兴 7 年(1137 年),三佛齐国派使抵临安港,南宋赐宴临安怀远驿。三佛齐国进献南珠、象齿、龙涎、珊瑚、香药等物。绍兴 26 年(1156 年),三佛齐使臣携来的“贡品”有 28 种之多,计乳香 81 680 斤、胡椒 10 750 斤、檀香 19 935 斤。淳熙 5 年(1178 年),三佛齐国使臣到临安,进献药材等物品十分丰厚。而南宋向三佛齐“回赐”的物品主要有金、银、钱币以及瓷器、绫、锦、绢等丝织品。三佛齐商人来浙江贸易的很多,他们所带货物主要是脑子、乳香、沉香、笪香、檀香、丁香、降真香、槟榔、椰心簞、阿魏、芦荟、黄蜡等。

婆,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南宋与 婆政府之间的“贡”、“赐”贸易不断得到加强, 婆向南宋输出的“贡品”,主要有象牙、珍珠、玳瑁、龙脑、丁香、檀香、杂色丝纹、杂色锈花销金丝纹、吉贝织杂色纹布以及玳瑁槟榔盘、藤织花簞等手工艺品。南宋向 婆的“回赐”品,主要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品等,据史籍记载,“赐金币甚厚”。(二十五史·宋史(下).册 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 768.)南宋浙江商人到 婆兴贩,主要用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缣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硼砂、砒霜、漆器、铁鼎(即铁锅)、青白瓷器等货品,与 婆人进行“交易”。婆出产丰富,向南宋输出的货物主要有沉香、速暂香、丁香、降真香、白豆蔻、椰心簞、犀角、玳瑁等产品。有些香料如降真香“其直甚廉”,又“能辟邪气”,泉州除岁之日,“家无贫富皆 之如燔柴。”(赵汝适.诸蕃志· 婆国.卷上:1225.)

菲律宾,南宋时中菲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贸易:一是官方贸易,表现为菲律宾的小国遣使到南宋朝廷朝贡,贡物有丁香、丁香母、白龙脑、玳瑁等,经济意义不大。二是民间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占居主流地位,使药物如真珠、玳瑁、药槟榔、椰心簞等流入浙江。

南宋时期,孟加拉国的犀角,印度和非洲的象牙、珊瑚、玛瑙、珍珠、水晶、珍稀木料(主要是檀香木和沉香木)、香料、樟脑、丁香、豆蔻等运入临安。大黄、黄连、干良姜等中药材从浙江一些港口运往马来半岛。

3.3 印度洋沿岸各国

南宋时期,浙江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大量的药材贸易。中药成品及药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印度,或借印度转运阿拉伯世界。中国的雄黄、黄连、合猫里、干良姜、麝香、肉桂等中药材输入印度南毗国(今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和故临国(今印度南端奎隆)。

“大食诸国”是南宋中药传入最多的地区之一,大致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包括中亚、西亚,以及北非、东非的一些地区,宋人都统称为大食。南宋时有许多中药转运到大食各国。当时,从浙江临安、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和澈浦等地辗转输往阿拉伯地区的中药材有大黄、干良姜、黄连、麝香、牛黄、合猫里、肉桂、莪术、肉豆蔻、曾青、车前草、五倍子等。而阿拉伯国家的

药材主要通过海路运至临安。自宋太祖开宝 4 年(971 年)至南宋孝宗乾道 3 年(1167 年)的 238 年间,大食进贡共 49 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 10 次。大食国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膻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扁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 50 株、蔷薇水 100 瓶、龙脑 100 两等。从阿拉伯地区输入的货物有银子、鬼谷珠、砂珠、珊瑚、琥珀、玳瑁、象牙、沉香、笺香、丁香、龙涎香、苏合香、黄熟香、檀香、阿香、乌里香、金颜香、上生香、天竺香、安息香、木香、亚沉香、速香、乳香、降真香、麝香、加路香、茴香、脑子、木札脑、白笃耨、黑笃耨、蔷薇水、白豆蔻、芦荟、没药、没石子、槟榔、胡椒、硼砂、阿魏、膻脐、藤黄、珍珠、紫矿、犀角、葫芦瓢、红花、腊、生香、修割香、香缠札、粗香、暂香、香头、暂香、香脂、杂香、苏木、射檀香、椰子。

南宋时,阿拉伯地区的一些药物制剂传入,推动了我国药物制剂法的发展。如蔷薇水是经蒸馏法制取的露剂,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朝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 5 有永嘉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使露剂药物在浙江等地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剂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4 医药交流的意义

综上所述,从南宋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传出和传入两方面来看,传出远远超过传入的规模。而且,从蛰居临安的南宋朝廷到浙江地区政要均直接插手这项工作,客观上推动了双边贸易。同时,邻国的官医、学问僧、医药学家来浙江研习中医药学后携宝回国的大有人在,浙江籍医药学家飘洋过海传经送宝者亦有。尤其是双方的药材进出口生意红火、品种繁多、数量庞大。浙江中药材的外传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份,对促进浙江地区与海外物质文化交流和海外各国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期,浙江丰富的中药材外传周边国家及阿拉伯世界,有助于扩大南宋浙江与海外各国的相互了解,铸成了双方的友谊。有官方往来的国家,由于蛰居临安的南宋朝廷及京畿中药材的输往巩固了两国间的传统情谊;没有官方联系的国家,由于这些名贵中药材的输往也建起了友好的网络,使得浙江主要市镇接待外宾的馆舍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呈现,外国接待中方人士的机构也纷纷建立。海外国家往往通过输往的中药材了解浙江和中国。南宋浙江人民亦通过外国朝贡的药材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舶来药品认识世界。国内外医药学的交流不仅有益于双边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医药事业的腾飞,而且繁荣了海上丝绸之路及双边的经贸事业。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浙江与海外国家的医药学交流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影响深远。不过,这一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学交流只局限于邻国,主要麋集在日本和高丽,很少涉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值得指出的是,南宋时期浙江与国外的医药交流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中外医药交流史、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严世芸.宋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 91- 92.
- [2] 斗 鍾.韩国医学史[M].汉城:韩国探求堂.1966. 120- 124.
- [3]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 5)[M].东京:日本埴山堂,1884.